

明清建水书院及文化价值

张黎明

(红河学院, 云南 蒙自 661100)

摘要: 建水是云南较早接受儒学文化的地区之一。元代就建有庙学, 明代始建崇正、景贤书院, 崇儒重道、著书讲学之风兴起。清代又分别兴建崇文、焕文、曲江书院。一时书院兴起、人文荟萃, 遂有“滇南邹鲁”“临半榜”之称。通过追本溯源, 分析建水书院所蕴含的文化价值与对滇南明清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 建水书院; 文化价值; 滇南明清文化

中图分类号: G 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 390X (2008) 05 - 0049 - 06

The Cultural Value of Jianshui's College in Ming-Qing Dynasty

ZHANG Li-ming

(Honghe College, Mengzi 661100, China)

Abstract: Jianshui is one of the areas which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Confucianism in Yunnan. Miao Xue (Primary education) was built in Yuan dynasty, Chongzheng and Jingxian college were built in Ming dynasty, then the ethos of Confucianism and Tao was prevailed. In Qing dynasty, Chongwen, Huanwen and Qujiang college were constructed. During that period, colleges and knowledge were popular, so Jianshui was called Diannan ZouLu (the cultural center in South of Yunnan) and Linbanbang (lots of test-takers in this area achieved good performances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The article traces back to its source and analyzes the cultural value of Jianshui colleges and the influence on the culture of southern Yunnan province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Key words: Jianshui college; culture value; Ming-Qing culture of south yunnan

书院, 自唐宋以来在中原地区作为私人讲学之所渐趋增多。而云南书院兴建的步伐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 只是到了明清时期随着书院的官学化方才兴建, 清代逐渐走向鼎盛。

建水地处云南之极, 顾名思义, 是“建设水利”的意思。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记载: “建水州, 附郭。唐时乌蛮地。古称步头亦称巴甸。元和间蒙氏筑城惠历, 汉语曰建水。”又载: “建水城, 每秋夏之间, 溪水涨溢如海, 夷谓海为惠, 大为历, 故以惠历名城。”^[1]明代谢肇淛撰《滇略》称: “建水州, 附郭, 唐乌么蛮地, 蒙氏城之曰惠历, 汉语为建水, 元置州。”元 1274 年赛典赤·瞻思丁治滇, 在建立行省的同时, 兴学

育才, 将儒家思想确立为办学的指导思想, 并且儒家的礼仪制度贯穿于办学的始终。赛典赤·瞻思丁认为“夷俗资性悍戾, 瞽不畏义, 求所以渐靡化其心者, 其惟学乎”。^[2]在他的身体力行下, 第一座孔庙于 1274 年在昆明始建, 其后学校教育推行到各府、州、县。伴随军屯、移民入滇屯田等政策的实行, 自明中叶已有大量的汉族人居住建水, 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明万历年间谢肇淛撰《滇略》记载: “临安之繁华富庶, 甲于滇中。谚曰金临安, 银大理, 言其饶也。”景贤、崇正书院得到兴建。至嘉庆《临安府志》又载: “明初徙江左族姓於其间, 风会日开, 人才辈出。名臣硕彦, 鹭次鹤聊, 允足领

收稿日期: 2008 - 11 - 01 修回日期: 2008 - 11 - 27

作者简介: 张黎明 (1981 -), 男, 云南建水人, 硕士, 助教, 主要从事民族文化与地方文化研究。

袖一方，比亦中夏矣。”崇文、焕文、曲江、崇正书院，人文荟萃，著书讲学之风日盛。

一、崇儒重教的儒家书院

明清时期，建水书院奉行开放的办学方针，承担着向社会传播知识文化的任务。书院的兴建不仅提升了建水作为滇南儒学文化中心的地位，而且与乡俗教化相融合，改善了当地及周边的蛮夷之风。书院多在官府的倡导下，与当地的乡绅联合筹资新建，官学与私学相结合成其最主要的特征，而其宗旨则是为了适应统治的需要，为科举考试培养人才。

叙说建水的文化史，首当要追忆的是王奎、韩宜可两先生。两先生居建水讲学达十五年之久，对于建水的民风习俗、科举文化有深远的影响。王奎，字景常，初名景，字景章，以避讳改今名，宋阳人。洪武初任怀远教谕，累擢山西右参政，以事谪戍临安。博洽多才，诗文高古，滇人事多从之游。后招还，预修《高庙实录》，为翰林侍读。永乐间升学士。韩宜可，字伯时，浙江山阴人。洪武间任山西布政，以事同王景常谪戍。心行纯实，能诗文。一时士绅多尊礼之，使弟子受学，后起升都御史。临安文学，倡于两公。明嘉靖按察副使欧阳重《修复寄贤祠记》云：“当是时云南始定，临始因元学重修之。两先生虽在军旅，实始俎豆为文学倡，若文翁之在蜀也，若韩子之在潮也。师表于兹，盖十有六年。于是士习始变，人文始著，临弟子始无有不学焉者矣。既而五云起为都御史，太原寻起为翰林侍讲，而临士亦始自永乐丙戌弟进士，侍者相望于朝也，两先生之功有不可诬哉。是故为师为弟子，莫不唯两先生教学是响。”^[3]正德《云南通志》谓：“初，临安人不知学，自二公来相与讲学庚唱，郡中子弟翕然从之，于是文教始兴，至今犹敬仰焉。”文庙寄贤祠内原有一碑，刻王奎所作《自铭并韩宜可铭》，铭文后右诗曰：“荷戈万里戍戎行，臣罪当诛心未忘。赖有诗书开远徼，敢云征召赴岩廊。军中子弟半珪组，奕世人才说建痒。志道双清昭国史，丹青不老近宫墙。”诗中可见献身边疆教育之丹心。为了表达对王奎、韩宜可两先生的敬仰，建水人除在文庙内建有寄贤祠外，又建了景贤书院以纪念之。明成化中副使包裕、戴书重建寄贤祠，同时增讲堂，学舍四十间。二日聚

奎丽泽，题大门额曰“景贤书院”。后郡人张绎有诗缅怀二公云：“郡斋犹记列诸生，小径书台南畔行。旧屋改迁文庙路，新祠重揭寄贤名。二公余韵叨闻久，十载间宫榷望轻。偏觅遗文难尽得，空瞻望像独含情。”

建水书院中，就影响和规模而言，当属崇文书院。旧名亦崇正书院。崇文书院从建置到规模均可以算得上滇南最完整的书院之一。书院建在府西城外，明嘉靖二年副使王忠建。嘉靖癸未，宪副王忠以分巡兼督学兵备来驻临安视学，见临安弟子多好学，州学虽弘敞而肆习号舍独少，将图另建书院以满足当地之需。见西郭外僧寺一区，地面高、面阳、视野广阔，遂将崇文书院选址于此。且嘉之曰：“辟邪崇正，处置有方，宜在亟成。于时公躬画条规，择任能官，俾撤寺而更置焉。遂揭崇正为名，盖以圣贤正学端习尚也。院之中为讲堂，后为退省轩，最后为乡贤，祠左右为号舍。”^[3]然万历年间，禁革书院，改为表忠祠，供奉永乐时率军征交趾简定叛乱的兵部尚书刘俊等死难诸公。时任姚安知府的思想家李贽，曾撰书一楹联悬于院中：“泪湿泸烟，今古谁非，臣子魂来格庙，春秋简在；帝心公寓，临将累朝，诏敕悉次第之，碑在城西。”书院后毁，仅存五贤祠、大魁阁。

康熙三十九年知府董弘毅等重建崇正书院。大门悬“崇正书院”匾额，《重建崇正书院碑记》云：“惟是书院而颜以崇正其名，义诚大矣，其隐为世道人心、风俗关者，匪微矣，要岂有他哉。实尊崇圣人之道，淑人心而招来学也。”^[4]尊圣、宗经一直是书院的办学宗旨，藏书、教学、祭祀自然成为古代书院的“三大事业”。书院内建五贤祠，祠内供奉先贤周敦颐、二程、朱熹、张载五位宋代理学大师。门额悬挂“斯文在斯”匾额。《重修崇正书院五贤祠记》云：“闻孔孟之道至濂洛关闽而尽，阐明先民黄干之言曰：道之正统待人而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人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已。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正统至朱子而始著，是故历代推崇已。”^[4]祭祀是维持社会秩序、联系祖先与后代的一种“礼”，“礼”约束着人们的行为，确定着文化与社会秩序的规范。宋明理学家所鼓吹的关于圣人、知识、信仰的道统重建，已经由想象的历

史变成了合理性、合法性的历史，并且这种上层知识分子的道德伦理思想转变成了民间教育与信仰。“礼”本于仁心。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礼重于外在的显现，而仁则内在于生命个体。故五贤祠左右分别建有以“存诚”、“主敬”命名的二斋房。《易·坤》“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孔颖达疏：“内谓心也，用此恭敬以直内。”《易·乾》：“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孔颖达正义：“诚，谓诚实也。”^[5]外在的武功始终是与内在的修养相联系的，“内圣外王”一直是儒生所追求的圣人气象。古人六岁始识字，七八岁教以日常简单的礼节，十岁教书写计算，十三岁教诗歌舞蹈，此就年岁而言。就季节来说，春夏学诗书弦歌，秋冬学书礼射猎。就一日而说，温习、进修、游散、休息，依时为之。^[6]因此书院内置《易经大全》、《书经大全》、《诗经大全》、《春秋大全》、《礼记大全》、《四书大全》等儒家经典教习之。院内讲堂三楹，讲堂之前有“宣谕亭”。每月逢朔望，知府率官绅宣讲“圣谕”儒家道学于此。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知府方桂增建书舍易名“崇文书院”。每年束修银一十九两一钱六分京斗谷四石。院中悬楹联一副：“堂壁焕前规，八郡人才今复萃；湖山终闲气，三迤文教此为宗。”崇文书院内多有名人宣讲于此。如生于书香门第，年少时“孝友内外无间，音弱冠即行”的张履程。履程系进士凤书第六子，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中举，官至陕西、华阴等地知县。为官期间，以“慈惠为心”屡有政绩，每到一地上任“老稚泣送”，“致仕归行”，嘉庆初期“行李萧然，惟书数篋”。归故里主讲“崇正书院”。并且著有《道学集要》、《滇南志》、《四库全书目录序》及《柏轩诗文集》等书。数年游历滇南后写成了《云南诸蛮竹枝词》。竹枝词本流行于巴渝一带的古老民歌，后经文人的改造变成了文人创作的一种诗体，在明清两代更为盛行。诗体新鲜活泼，抒情味浓，有强烈的乡土气息。如《黑乾夷》一首：“深山密箐互相招，推髻筛盘态可描。不用冰人议婚嫁，彝歌一曲当琴挑。”再如《土僚》：“红巾青悦白衣裙，佃种原田五亩余。羊鼓冬冬齐起舞，孟冬朔日是春初。”其诗词多为滇南民俗风情的反映。而其著此书的目的则是：“愿诸种人生圣人之世，咸如洗心涤虑，去浇就

淳，毋自外于成，而同率夫礼教也。”可见他希望边地蛮族也受到儒家诗教的熏陶。1799年（嘉庆四年），内阁大学士尹壮图，回乡主讲崇文书院，并手书“藏书楼”三字，悬于楼。道光十七年知府郑绍谦别建书院于城内，此院逐渐倾废。昔日崇儒重道、书声朗朗的崇文书院，已杳无人迹。唯剩一条以“崇文”命名的古街映证往日的辉煌，留下了崇儒向学的进士、举人、秀才的足迹。光绪年间罢科举，于崇文书院旧址内设两等小学校成西分校。崇文书院内有百年的榕树一株，枝繁叶茂遮盖院内半个天空，相传民国五年（1916），忽见一鹤飞来，丹顶，白羽，栖息树颠，千百只白鹭护其周围，六七日飞离，人称“百鸟朝凤”，一时传为美谈。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于此创办建水县立师范学校，后刘宝宣于此创立“建民中学”。崇文书院五百年积淀下来的儒家出世、平天下的思想影响着这一胜地，建民中学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成为革民根据地，为革命输送的人才居全滇之冠。

道光十六年，知府郑绍谦于建水任职，得知建水近几年瘟疫大发，见“村落荒凉，闾阎凋敝，观风校士，横经讲艺者亦复寥寥。”^[3]在府学就读的生员大为减少，旧有的崇文书院，因地处西门外，历年既久，半就倾废。遂于城内东北处，新建崇正书院。书院除了讲学、藏书、祭祀之外，同时面向民间社会开放，进行文化交流。中国传统的建筑均受到儒家礼教的影响。“礼者，天地之序也。”礼规定了王公贵族的建置规模同样也规定了书院的建筑秩序。崇正书院位阴面阳，从建筑规模而言仅为三进式院落，主体建筑群大门、讲堂、藏书楼、祠堂均坐落于中轴线之上。两边为小楼，左楼为山长下榻之区，右楼为管事绅衿办公之所。堂之东西学舍三十环之，而中门以外大门以内封启者为监院公馆、为乡绅公社。整个院落体现了儒家“以中为尊”、讲究“均衡”、“对称”的特点。书院为讲学教化之所，因此在这对称的空间中所感受到的是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相融合的“中和”之美。空间布置井然有序、洞远周通，整齐端直。据传崇正书院之后原有一湖，乃是读书之绝佳之境。“知者乐山，仁者乐水”。儒家比德传统与重风水的思想影响着书院的选址与建造。书院旁翠柳成荫，湖中荷花朵朵。周敦颐《爱莲说》写道的：“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

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书院内多种菊花与建水的特产石榴树。唐人咏菊曰：“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宋代周敦颐《爱莲说》：“晋陶渊明独爱菊，……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菊花被赋予了隐居的内涵，也同梅、兰、竹被奉为文人品质高洁的象征。石榴，乃建水特产，其外貌“千房同膜，十子如一”，象征多子多福。建水旧俗逢婚嫁，女方送男方礼物中定要有石榴，婚礼上吃一个，祝愿多子多福。书院内植石榴则喻人才聚集，造福一方。院内讲坛还悬有楹联一幅：“广厦构群材，趁此日风雨晦明，砥砺廉隅，经术即堪为治术；秋闱分半榜，想当年衣冠文物，驰驱皇路，后贤何必让前贤。”巨匾长32厘米，高121厘米，厚80厘米，上刻有郑绍谦题写的楷书“讲堂”二字，落有上下款，上款为“道光戊戌仲秋之吉”，下款是“临桂郑绍谦立”。此联勾起对昔日临安家絃户诵，人文、科甲蔚起盛况的追忆，也不乏重振文风之雄心。郑绍谦在《新建崇正书院记》云：“今郡民被灾，非如畴昔之惨，振衰起靡，固自易。易士特患无志耳，遊斯院者，果能恪守儒先为学之旨，穷理致知，躬行实践，循循致致始终不倦，则斯院之设且与鹅湖鹿洞比迹，又安虑气数之足，累而衰。于今者逐不可复盛於后哉。”^[7]往事如烟，自比鹅湖、白鹿洞的宏愿未能如愿。为纪念崇正书院曾经为建水科甲与人文复兴，所作出的贡献，将所在的街道命名为“书院街”。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停科考，崇正书院改为高等小学堂。今为建水第一小学。

除了崇文、崇正书院外，建水还于康熙五十五年在城东小石桥建焕文书院，布置格局和崇正书院相似，请崇文书院山长主讲。光绪年间在距曲江城百余里的地方又建曲江书院。由于历史文献的制约这两家书院的历史相对难考。

二、书院的文化影响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书院是人类文化的产物，影响着古代政治秩序的建构与文化的发展。至唐开元年间建立丽正书院以来，书院聚集了一批忧国忧民的文人学士，他们力图通过科举参与到政治角逐之中。陈寅恪先生指出：“从武则天到唐玄宗时代，唐代社会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外廷之士大夫’逐渐取代原来的‘关陇贵

族’而崛起。”^[8]书院的兴建促进了教育的普及，士人表达自我文化意识的权力得以迅速膨胀，获取知识的权利从贵族走向了民间；而教育的普及，使得更多的读书人踏入仕途，走上选官治理国家之路。一旦身处平民社会的知识精英掌握了权力，则影响着整个知识阶层风尚的改变与政治力量的对比，进而影响国家的大政方略。“什么人实际受到教育，什么人适应改变了的教育体制，教育的目标使社会风尚有什么样的改变”^[9]这些属于教育史的现象对政治制度、民风民俗的形成有相当大的影响，书院的兴建促进着这一地区在明清时期完成了社会文化的转型。明初朱元璋规定：“非科举者，毋得与官。”石屏玉屏书院有对联：“何事关心，二月杏花八月桂；是谁催我，黄昏灯火五更鸡。”崇尚科举、崇尚儒学象征着这一地区已在文化、政治上纳入了“大一统”的进程。建水明清以来在科举考试中人文蔚起号称“临半榜。”整个明代，云南省“共举办了81次乡试，共取中文进士216人，武进士47人。即中文进士253人”。其中建水出现文进士30人、武进士25人，共计55人，占据整个云南省的五分之一强。另外明代建水出文举人299人、武举人35人。清代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统计，康熙朝61年，21科，共录取进士4088人，年均67人；雍正朝13年，5科，共1498人，年均115人；乾隆朝60年，27科，共5385人，年均90人，……总计清朝科举会试102科，共录取进士26362人，平均每科235人，以262年计，每年平均100人。^[10]建水在整个清代共中文进士37人、武进士18人，共计55人。另外中文举人464人、武举人475人。明清两代建水共出现文武进士110人、文武举人1273人，仅次于昆明。包见捷言：“先王所以陶铸天下，津梁万物，莫先于学。”建水自1411年（永乐九年）出现第一个举人，1442年（正统七年）出现第一个进士后，历次开科取士登贤书（中举人）和金榜题名（中进士）者，皆不乏其人。今天我们已无法考证这些进士、举人们是出自哪个学堂、书院，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建水存在五百年的书院对于科考、人文士气的影响是功不可磨的。天启《滇志》记载：“建水土秀而文，崇尚气节，民专稼穡，衣冠礼度与中州埒，号诗书郡。”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记载：“郡治之近，山水明秀，所

生人物俊伟者，多家有诗书，‘吾伊’之声相闻，而科贡后先不乏。前儒士张景云有诗云：‘一方总号诗书郡，六诏咸称礼乐邦’。《科甲题名碑记》称：“临安又居云南极边，而宾兴之士掇巍科者，有一榜半临阳之称。”^[3]

“书院之建，为明道也”。书院是民间传播知识的重要渠道，宽松的办学环境、学术大师云集，讨论着天理人欲、格物致知等等形而上的话题，使其成为学术研究、著书言志的好去处。从著书方面来看，建水当地文人在明清两代均涉及经部、子部、集部的著作。现摘录如下：^[11]明代建水人著述：

第一，有关经部著述：杨应桂《自知楼点易集》三卷，马之晋《小学注解》；

第二，有关子部著述：张绎《东岩录》，杨士云《皇及天文律吕咏史集》、《宏山语录》，徐澜《熟训会语杂稿》，叶瑞《河洛解律吕书》，毛玉《忠录》，杨道明《字法律要》，释禅《老子注解》；

第三，集部：罗镛《讷轩集》和《复斋集》，刘容《豫斋集》，万文采《涪南诗文稿》二卷，郭镛《桂林集》，江浚《退庵集》萧瑄《遁庵集》。

清代建水人著述：

第一，有关经部著述：彭鼎重《读易管见》，傅为纮《读礼偶存》，何天俊《五经解》，张从孔《四书讲义》；

第二，有关子部著述：刘彪《俭录》，余大观《汉昌锁言》；

第三，集部：叶涑《诗文集》四十卷，邢于耀《象山诗稿》，傅为纮《藏密斋诗文钞》，刘恬《吹埙吟》，谢奉璋《宦游拟草》，卮兆凤《袭兰斋集》，李凤彩《银堂诗集》、《杜诗中伦注解》，吴官《东明山草》，田柴庭《川北集》，傅崑《文类偶存》一卷及《未焚草》二卷，曾琦《可石小草》，张履程《柏轩文集》一卷。

罗伯特·雷德费尔德在《农民社会与文化》中使用过“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概念。“大传统”指的是上层社会知识分子所代表的高水准的经典文化；这多半是受思想家的影响而产生并已广为流传的精英文化。“小传统”则指下层老百姓特别是多数农民所代表的民间习俗与文化。大传统引导着小传统的走向，小传统提供真实的文化素材。他自己还说，这两个传统还被称为“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民间文化和正统文化，通俗文化与学者文化，除此之外，还可以称之为

‘科层文化’和‘世俗文化’。”^[9]建水地处边疆，接受中原的儒学文化较早，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范围来看建水儒学文化并非主流，而是受了“大传统”影响而产生以适应边地文化的“小传统”。对于聚集于建水当地书院中的上层知识精英而言，他们所传承的文化恰好属于“大传统”，“大传统”必然要对下层百姓的文化民俗生活即“小传统”产生影响。上述明清以来建水人在科举、著述所取得的成绩即可以说是深受“大传统”影响而产生的且是较为实证的文化观念层面。然书院的文化影响不仅局限于此。赵仲牧先生认为：“文化的观念层面主要涵盖四种类别的观念，即求知的观念、德性的观念、信仰的观念和审美的观念。而这四组观念皆同源于人的本性的精神性需要有关，都是为了满足民族群体及其文化传统的深层需要而逐渐形成的价值观念。”^[12]建水所处的地理位置，自元以来恰好是“罗罗”等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较的地区。元李京《云南志略》云：“罗罗即乌蛮也，男子推髻，摘去须髯，或髡其发。左右佩双刀，喜斗好杀，父子昆弟之间，一言不相下，则兵刃相接，以轻死为勇。……妇人披发，衣布衣，贵者锦缘分，贱者披羊皮，乘马则并足横坐，室女耳穿大环，剪发齐眉，裙不过膝，男女无贵贱皆披毡跣足，手面经年不洗。夫妇之礼，昼不相见，夜同寝，子生十岁不得见其父，妻妾不相妒忌。”可以说，明代以前，建水地区的居民在求知的观念、德性的观念、信仰的观念和审美的观念，与“罗罗”等这些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且是十分相似的。而到了明以后，据《建水县志》记载：“建水僻处滇南，民风浑朴，颇为近古。男务耕读而自耻偷惰，女羽勤劳，而众戒嬉游。于此进斯民以弦歌之雅於变时。”可以看出，少数民族的蛮夷之风逐渐减弱，而儒家的重诗书礼教、重农耕等文化观念渐为当地百姓接受。从明清的地方志记载来看，烈女孝妇、忠义之士、乡宦名贤等儒家所倡导的礼教观念、人伦道德成为后人学习的模范。明以后建水逐步建造的体现祖先崇拜观念的祠堂不计其数，并且对于儒家圣域——文庙，进行了数十次的维修与扩建。尊孔敬儒、崇尚诗书的习俗逐渐代替了蛮夷之风。节日庆典，已经与中原无多大的区别。万历《云南通志》记载：“（临安府）号诗书郡，士尚气节，民知学，婚礼近古。”

然对于临安府附近的郡县记载却说：“近郡之夷名乌爨……一言不合引刃仇杀，死则以财物赏之，非德化所能怀柔，惟董之以威庶可习服。”就同一历史时期与地域而言，建水可谓云南境内汉化较早的地区，因此在顺治年间进行的改土归流也得以顺利地进行，土司的势力受到削弱逐渐接受汉人的领导。可以说，上述文化观念的转变，与作为传播儒学文化阵地、文化传播重要载体的书院有着密切地联系，书院对于当地逐渐接受礼乐文明而改蛮夷之风的文化影响，可谓润物细无声。

文化传播学派曾经提出了“文化圈”学说与“文化中心论”。文化中心论者认为某些文化元素或文化特质，起源于某个地方，通过传播到了另外的地方。当一个别种文化元素到了自己的文化之中，是通过己方文化的接受、互动、吸收、学习种种方式得以站得住脚的。^[13]滇南地区从历史上来看多为乌蛮、和蛮等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而建水自明以来伴随外来移民、屯军、流放等人口的增多，逐渐从蛮夷之地形成礼乐之邦，可以说是滇南儒学文化的中心。明代科举的兴盛、府学、县学、书院等一系列文化教育机构的设置与文庙内每年大规模祭孔仪式举行，均可以说明，时为临安府城的建水作为滇南儒学文化中心已经显现。格雷布内尔，继承了文化圈理论的基础，认为文化具有区域性，文化圈从空间角度，注重文化特质的文布状态。格雷布内尔认为，无论物质文化形式，还是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某些现象，都属于文化因素，他把具有相似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民族划为一个文化圈。^[13]建水儒学文化的传播与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地域的扩展，使得明清两代儒学在滇南地区逐渐繁荣，通海、建水、石屏、蒙自一带形成了儒学文化圈。而在这过程中有着五百多年历史的建水书院其文化影响深远。自建水兴办景贤、崇正等书院之后，其它各地迅速效仿。据《新纂云南通志》记载，整个临安府在清代建书院达47所之多，居云南省之首位。地处边疆的元江，早于明天启三年曾经在建水文庙内建立府学，聘请建水当地的教师教育其学生。道光《元江州志》记载：“夷中向学者鲜，诸生多以临安府属人充之，教官亦侨寓临城。天启三年始建学署于建水学左，为师生讲学之所。本朝顺治十六年改土设流，迁学署于元江城内。”

据《建水州志》记载，寄学元江学府的生员考中举人的明代有18人。康熙至雍正年间有10人，清代还有贡生28人。《重建元江府儒学公署记》曰：“元距临三百余里，于临置学署制欤？”曰：“郡乘载之，盖学校之地以教为职，非若他有司之责，以官守画地而限者也。元之士半皆临属之士，临而教之，其地益亲，其教尤易行矣。”石屏与建水山水相连，从科举方面看，明代石屏仅中进士5人，而到了清代则中进士51人，其中朱淳于清道光九年中第二甲第一名，袁嘉谷于光绪二十九年中经济特科状元。

建水书院文化五百年的兴盛发展，成就了滇南儒学文化的繁荣，对于明清滇南的科举、教育、民俗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书院是建水千年文化的积淀，是古代传统文化的瑰宝，是在民族地区文化传播的物质依托。可以说，明清滇南的科举盛况，汉化的进程乃至明清时期滇南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转型都与书院的存在有着密切的联系。

[参考文献]

- [1] [清] 顾祖禹. 读史方輿纪要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 [2] 蔡寿福. 云南教育史 [M].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1.
- [3] 建水文庙历代碑文选注 [M]. 杨丰校注. 建水文庙管理处编印.
- [4] [清] 祝宏修, 赵节篆. 建水州志 [M].
- [5] 周易 [M]. 宋祚胤注释. 岳麓书社, 2000.
- [6] 钱穆. 论语新解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 [7] [近] 丁国梁. 建水县志 [M].
- [8] 陈寅恪.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 [9] 葛兆光. 中国思想史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 [10] 李树. 中国科举史话 [M]. 济南: 齐鲁书社, 2005.
- [11] 木芹, 木霁弘. 儒学与云南政治经济的发展及文化转型 [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9.
- [12] 赵仲牧文集 [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3.
- [13] 孟惠英. 西方民俗学史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 [14] [清] 嘉庆. 临安府志 [M].